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三次修改

回望《讲话》
发表 70 周年



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史称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引言部分等重要讲话。这是毛泽东和参加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的代表合影。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重要文献在历史上曾先后出过四个版本，经历了三次不同方式的修改。

根据亲历者的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毛泽东亲自参加的会议有三次。1942年5月2日下午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会议室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由毛泽东和凯丰主持，主题是“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毛泽东发表了“引言”。5月13日，举行了延安戏剧界集会座谈，中心议题是“文艺运动的普及和提高”问题，毛泽东没有参加。其后，毛泽东参加了5月16日召开的座谈会，认真听取发言并做记录。5月23日会议再次召开，毛泽东在当日晚饭后做了题为“结论”的讲话。毛泽东的讲话当时由周昆玉等人做了速记。据考证，这个记录稿曾于座谈会的当月，即1942年5月被七七出版社印行过，可以称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

是妈妈，我叫她老师

“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仪式上，有一幕，深深打动了我的心。

成都支教教师胡忠、谢晓君夫妇抛弃城市的优越生活，举家扎根边疆支教，当选“感动中国”人物。主持人介绍完他们的感人事迹后，请他们上台领奖。夫妇二人牵着女儿的手挥舞着手臂从幕后走出来，步行至舞台中央时，全场的掌声经久不息。

后来，主持人请他们坐下来。坐在夫妇二人中间的那个小女孩，很快引起了主持人的注意。主持人笑着说：“我们和这一家人见面的时候，其实我最想跟谁说话呢？想和小姑娘说话。”

小女孩听了，羞涩的笑浮现在脸上。

“听说你还有一个藏族名字，叫什么？”主持人一副好奇的样子问她。

“田桑拉。”小女孩回答得很爽利。

“什么意思？”主持人皱了一下眉头，一副不解的样子。

“时光。”小女孩回答得很有力，能看得出她对这个名字很满意。

第一个版本。

为了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解放日报》于1943年10月19日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二天，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组织收到这一篇文章后，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内外人士中去”。当月，延安解放社即正式出版了单行本，正文前附有《解放日报》编者按。对这个版本，人们习惯称之为“解放社本”或“1943年本”。对照“七七社本”和“解放社本”，我们便可发现毛泽东对这篇文稿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这次修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语言进行了润饰。七七出版社印行的版本由于基本上是当时讲话的记录稿，口语的气息依然很浓郁，还保留着一些俏皮的话语，后来感觉过于口语化，就对这些词语进行了增删和修饰。二是加入了配合当时政治工作的言辞。例如，当时由于受“抢救运动”的影响，解放社本增加了“特务文艺”的说法，说在中国除了封建文艺、资产阶级文艺、奴隶文艺之外，还有一种特务文艺，说在文艺界党员中，除了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以外，还有一批更坏的人，就是

组织上加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随后又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1951年2至4月，毛泽东利用在石家庄调研休息时间，开始着手修改《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的初选文稿，其中包括对《讲话》的修改。这次修改是在解放社本的基础上进行的，据统计共修改了670余处，其改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强文本的逻辑性和理论色彩。为了使文本读起来更加顺畅，毛泽东修改时增加结构助词“的”。或者把有地域色彩的、方言性的词换成通用的词，例如把“虽然出不出好东西”改为“虽然拿不出好东西”等。二是增强文本的规范性和书面色彩。为了进一步消除口语色彩，使相关提法更加规范化，毛泽东把“抗战以后”改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把“内战时期”改为“十年内战时期”。三是修订某些已不适应于时代的提法。例如把“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奴隶文化”改为“买办文化”，把“红军战争”改为“革命战争”，把“日本法西斯”改为“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删去了所有关于“特务”问题的文字。从这些变动中不难体会毛泽东对于这篇文献的重视和修改的精细入微。

1991年，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对《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进行修订，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之际出版。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献来说，修订工作主要是校订注释，正文没有改动，即只改正注释中某些不准确的史实和提法。归纳起来，改动的注释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关于列

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在原来的注释中，列宁的这篇文献被翻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91年版被更改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第二个是对梁实秋注释的改动。原来的注释说“梁实秋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他在长时期中宣传美国反动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坚持反对革命，咒骂革命文艺。1991年本改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第三个是对周作人和张资平注释的改动。原来的注释说“周作人、张资平在一九三七年日本占领北平、上海后，先后投降日寇。”1991年本改为“周作人，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张资平，广东梅县人。他写过很多小说，曾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兼任教职。周作人、张资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

通过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次修改情况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绝不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献看成终极真理，而是随时注意总结历史规律和发展经验，使这些思想日臻完善。同时，这一过程也生动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不是停滞不前，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完善的。

（摘自《光明日报》，作者为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中心庄桂成）

“我不伟大”演绎道德接力

日前，天津的哥马志刚拒收了一位盲人乘客的车费，称“我不伟大，我挣钱比你容易”。当他把这个事告诉下一位乘客后，这位乘客下车时坚持多付费给他，称“我也不伟大，挣钱比你也容易点”。这段“跑车录”被发到了微博上，感动了很多，有网友称，“又开始相信这个世界了”。

“你给他这点光亮，让他起码感受到这社会不黑。”在帮助盲人之后，的哥老马这样说。给别人光亮，也同样会照亮自己。盲人与的哥，都是挣钱不容易的群体，这种“底层互助”，正是社会力量走向强大的重要生长点。事实上，当下一位乘客自觉接过这道德接力棒，就寓示着，社会为公共生活更加美好发挥出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从社会底层开始，让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向上流动，为告别“互害型社会”提供了一条自我救济的路径。制度可以改变生活，但生活同样可以引导制度向善，激励制度重建。在我们这个“陌生人社会”特征更加明显的今天，每个人对社会的积极贡献，其实都在改变这个时代，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单士兵 / 文）

嘉明经济开发区
村级计生专管员充分发挥“八员”作用

本报讯 嘉明经济开发区结合新形势下计划生育工作的特点，充分调动村级计划生育专管员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专管员“八员”作用，计划生育出现了良好局面。

一是宣传员。营造舆论氛围。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及时总结经验，宣传好的典型，做到人人明白，妇孺皆知，大力营造婚育新风尚。二是联络员。做到上传下达。及时传达和部署上级关于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系列要求和任务；及时向上级反映计生工作中出现的群众反映强烈的困难和问题，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及时总结、推荐计生工作中好的做法和典型事迹，使计生工作不断迈向新台阶。三是调研员。在农户家中，在田间地头，村级计生主任与育龄对象交

流谈心，了解群众需求，倾听群众心声，征求群众意见，摸清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为做好新时期计生工作及领导决策提供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四是指导员。利用农闲时间，对育龄妇女生殖保健以及产前、孕中、产后注意事项等进行指导。五是服务员。为育龄群众提供优质服务，组织党员干部、群众为计生困难家庭送温暖、献爱心、帮生产、解急忧，最大限度从服务距离、服务方式、服务内容上贴近村民，解决育龄妇女生活中诗类困难。六是信息员。及时掌握育龄妇女流入、流出情况，结婚证办理情况，生育情况，节育措施落实情况以及孕情查体情况，做细做牢计划生育基础工作。七是公开员。坚持按要求公开本村婚、孕、育、节育措施、奖励扶助、流动人口等情况，督促村委会按时召开计划生育村务公开会，保证群众对计生工作的有效监督，推进村民自治。八是保管员。做好人口出生统计报表、流动人口、计生协会等各类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保管工作，确保达到规范化要求。

（通讯员 李航）

人口与计划生育专刊

东昌府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局协办

一个民族，唯其拥有振奋的精神、高尚的品格和坚定的意志，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环顾当下，面对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我们必须焕发文化的力量，激活熔铸于我们血脉中的优秀文化基因。展望未来，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更要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用文化的力量传承民族血脉，建设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942年的5月，在小楼清爽的会议室和楼门前的小广场上，从各地赶来的文艺工作者先后参加了三次全体会议，探讨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先后发表两次讲话，最终整理形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于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周年之际，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

讲话发表之时，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千千万万将士正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文化界名人和知识分子陆续来到延安，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最广泛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旗帜下……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毛泽东的讲话拨云见日，廓清了文艺工作者的困惑。他们纷纷走出书斋，投身沸腾的生活，走入人民大众之中。

《南泥湾》《翻身道情》……一句句激情洋溢的歌词在当时年仅20岁的贺敬之笔下喷涌而出，他仿佛一夜间找到澎湃于心的灵感。此后，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诞生了。70年过去，这部歌剧从延安演到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几代中国人，成为经典。

当代中国研究所学者曹光章说：“五四运动”开启了文化启蒙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第一步，却依然局限于一批知识分子的觉悟与观念，没能真正形成贴近民众的、系统成熟的文化理念表达。直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高度重视文化的力量，提出文化为人民服务的主张，指明了一条正确的文化救国的道路。”

虽然也曾有过曲折，但70年穿梭，灯火不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址前，站在保存着当年模样的油灯下，毛泽东发出的论断依稀回响在后辈耳边——

“讲话中有关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尤其是文艺为什么人的论述，较早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白烨说，“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它依然散发着思想的光芒。”

（张严平 吴晶）